

中东国家政党政治

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两党政治格局的演化

李睿恒

摘 要：1946年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的成立，奠定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党政治格局形成的基础。在土地改革、城市化、私有化和两伊战争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末形成了以库尔德民主党与库尔德爱国联盟为主导的两党政治格局，并在1991年和2003年后不断得到强化。但地区社会与经济脱节的脱节催生出新兴的政治反对派及其对旧有格局的挑战，使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在伊拉克战争后向两个阵营并立、三股力量互动、两种理念竞争的政党政治格局方向演进。

关键词：伊拉克；库尔德人；库尔德民主党；库尔德爱国联盟；政党政治

作者简介：李睿恒，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2017级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文章编号：1673-5161(2018)06-0003-14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自 1991 年设立“禁飞区”以来,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以下简称“伊库区”)自治程度不断提高。2003 年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库尔德人的联邦自治地位被写入伊拉克宪法;石油经济的发展大幅提升了伊库区的经济状况;伊库区安全形势保持相对稳定的态势。但在伊库区实现高度自治的同时,其政治形势也陷入了严重的动荡。在外部地缘政治环境动荡、伊拉克国内政治力量变动、伊库区内部政治派系竞争、库尔德政治精英个人动机等因素的影响下,以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和伊拉克库尔德爱国联盟为主导的两党权力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本文聚焦于伊库区两党政治格局的演化,考察伊库区两党政治格局的历史形成及其发展所依托的社会、经济基础,进而分析伊战后该格局面临的挑战,并对其未来走向进行展望。

一、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两党政治格局的形成

对政党政治的研究,不能局限于政党行为本身,而是必须引入对其发展基础的考察,即把决定政党行为模式的社会、经济和思想基础纳入研究视野。这既是如实反映政党政治现实的需要,也是准确定位与把握政党行为的关键。

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两党政治格局的形成与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Kurdistan Democratic Party,以下简称“库民党”)的成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①作为库尔德人早期建立的政党之一,库民党的起源可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在城市中兴起的“青年”(Komala-I Liwen)、“伐木工人”(Darkar)和“希望”(Hiwa)等库尔德政治组织。这些组织主要由受过世俗教育的城市军官、官员和教师组成,信奉共产主义,与伊拉克共产党(Iraqi Communist Party)联系密切。1943 年 6 月,穆斯塔法·巴尔扎尼(Mustafa Barzani)^②带领巴尔扎尼部落发动起义,打出民族主义的口号,“希望”等组织也加入了起义行列。^③1945 年 10 月,毛拉穆斯塔法流亡至伊朗库尔德地区。马哈巴德共和国(Mahabad Republic, 1946 年 1 月~12 月)和伊朗库尔德民主党的成立使毛拉穆斯塔法意识到,起义的成功需要部落与受教育的城市政党结盟。^④1946 年 8 月 16 日,毛拉穆斯塔法联合多个政治组织成立伊拉克库民党。同日,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巴格达秘密举行,推举流亡中的毛拉穆斯塔法为党主席。根据党纲,库民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政治意识形态,旨在推翻伊拉克的王朝统治,结束帝国主义对

^① Gareth R. V. Stansfield, *Iraqi Kurdist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Emergent Democrac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61.

^② 穆斯塔法·巴尔扎尼一般被外界称为“毛拉穆斯塔法”(Mullah Mustafa)。

^③ 关于这次起义的性质,参见 Willem Adriaan Veenhoven, ed., *Case Studies on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A World Survey*, Vol. 2,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5, p. 147; David McDowall, *The Kurds: A Nation Denied*, London: Minority Rights Group, 1992, pp. 290-293.

^④ Gareth R. V. Stansfield, *Iraqi Kurdist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Emergent Democracy*, p. 65.

伊拉克的控制。^①但由于伊库区当时以农业占主导的经济结构,部落依旧是有效进行政治动员与资源整合的社会组织形态,因此库民党建立时带有浓厚的农村和封建色彩,其本质上是占少数的城市左翼力量与农村部落的权宜联姻。^②巴尔扎尼部落在其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左翼力量提供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行动框架,二者缺乏互信,相互利用,毛拉穆斯塔法在两者间发挥着关键性的纽带作用。

1947年至1958年毛拉穆斯塔法流亡期间,部落间的冲突淡化,经济矛盾是伊库区主要的社会矛盾。这一时期,库民党由易卜拉欣·艾哈迈德(Ibrahim Ahmed)代表的左翼力量所主导。^③自20世纪50年代起,农业机械化和地主的剥削使农民的生存状况恶化,左翼力量获得了更大的社会基础。库民党与伊拉克共产党加强联系,党员互为成员,库民党左翼化趋势明显,形成了以易卜拉欣·艾哈迈德和贾拉勒·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等左翼人士为核心的领导层。部落力量在看到社会经济状况恶化和民族主义思想左翼化的局面后,采取审慎态度,对党内左翼力量的领导权予以默认,疏远了与君主政府间的关系。^④

1958年,自由军官政变推翻了伊拉克君主制度。在阿卜杜·卡里姆·卡塞姆(Abd al-Kareem Qassem)的邀请下,毛拉穆斯塔法结束流亡回到伊拉克。毛拉穆斯塔法对库民党的左翼化感到不满,但部落力量担忧巴尔扎尼部落的强大会导致其失去土地,不愿给予其支持。随着卡塞姆权力根基的稳固,伊拉克政府与库民党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土地改革的开展使毛拉穆斯塔法重新获得部落支持。由于卡塞姆亲苏的外交政策,苏联减少了对库民党的投入,毛拉穆斯塔法因此开始向美国寻求帮助。卡塞姆对伊拉克共产党的打压,使苏联再度对左翼派系给予支持,但并不稳定。1961年至1975年期间,伊拉克政府和库尔德人一直处于持续的军事对抗和断断续续的谈判之中。左翼派系基于自身弱势的现实与毛拉穆斯塔法保持着脆弱的联盟。两个派系在反对中央政府方面有所合作的同时,也在各自寻求外部力量相互牵制,争夺党内的最高领导权,难以统一立场一致对外。

1968年复兴党上台后,伊拉克政府凭借丰厚的石油收入开始实行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进一步推动土地改革和城市化发展,旨在打破伊拉克传统的部落经济结构。在伊库区,大量库尔德农村人口迫于村落的衰败涌入城市谋生,部落结构遭到冲击。这构成了库民党分裂的背景,库民党内部就政党性质、意识形态、斗争路线等议题进一步产生分歧。以贾拉勒·塔拉巴尼为首的年轻一代认为毛拉穆斯塔法代表的部落是反动落后的封建阶级,库尔德民族独立运动的基础已转到城市,以农村部落为基础的斗争策略应该遭到摒弃。随着1975年两伊签署《阿尔及尔协议》,毛拉穆斯

^① [伊拉克] 哈密德·马哈茂德·尔撒:《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从英国占领到美国入侵(1914~2004)》(阿拉伯文),开罗:马德布里出版社2004年版,第288页。

^② Edmund Ghareeb, *The Kurdish Question in Iraq*,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39.

^③ 汪波:《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50页。

^④ Gareth R. V. Stansfield, *Iraqi Kurdist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Emergent Democracy*, p. 67.

塔法失去美国和伊朗的秘密支持,库尔德起义失败,党内分歧持续激化。1975 年 6 月 1 日,贾拉勒·塔拉巴尼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宣布脱离库民党,组建库尔德爱国联盟(Patriotic Union of Kurdistan,以下简称“库爱盟”)。库爱盟将自身定义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政党,代表伊库区工人、农民与城市中产阶级的利益。

需要指出的是,土地改革与城市化虽“对库尔德的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了影响,并成功地塑造了一批依附于中央政权的中产阶级”,但“只有极少的库尔德人被雇用”^①。伊朗库民党领导人阿卜杜·拉赫曼·卡西姆鲁(Abdul Rahman Ghassemlou)进一步指出,石油开采往往被帝国主义公司或国家政权把控,因此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库尔德工业资产阶级,所谓的库尔德中产阶级实际上只是一批为数不多的无产阶级工人,并不足以构成革命性的政治力量。^②事实上,伊库区城市化进程是伊拉克国家政策的产物,单一的石油工业基础使得这些“新兴城市”吸纳就业的能力有限,大量库尔德移居人口成为无业游民,只能选择向政府庇护下幸存的库尔德部落寻求生计与安全保障。在某种意义上,部落对城市实现了离岸式的控制。城市化进程也没有政府预想的那么顺利,直到 1977 年,农村人口依旧占伊库区总人口的 51%。^③受制于此,库爱盟的组织形式和斗争策略尚无法超越库民党,塔拉巴尼依旧需要依靠自己的部落势力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敢战士”(Peshmerga)^④来扩展新生政党的力量。

1980 年至 1988 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政府为弥补财政亏空,于 1983 年放松对经济的控制,推行私有化,向私企和个人租赁和买卖土地。大量与政府保持亲密关系的库尔德部落首领重新获得土地并进入商业领域,转变为地主与城建合同商,跻身中央政府庇护下的城市暴富阶层。埃尔比勒北部哈里里平原的苏尔齐部落(Surchi)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一过程被荷兰学者米歇尔·李赞伯格(Michiel Leezenberg)形象地描述为“部落结构在城市化背景下得到了新生”^⑤。部落的强化还表现在军事安全层面。为对抗伊朗和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大量库尔德部落在伊拉克政府的支持下组建起非正规军。两伊战争后期,伊拉克国内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政府出于对粮食的迫切需求,继续将更多的土地租售给亲政府的库尔德部落来发展农业。伊库区随之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大量库尔德城市无业游民重新返回农村,进一步夯实了部落在库尔德社会中的基础。农村的复苏与部落的壮大在两伊战争末期引起了伊拉克复兴党政权的警惕。1988 年 2 月至 1989 年 4 月,伊拉克军队对伊库区展开“安法尔行动”(Al-Anfal campaigns),约 4,000 座库尔德村庄连同其农

① Gareth R. V. Stansfield, *Iraqi Kurdist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Emergent Democracy*, p. 44.

② Abdul Rahman Ghassemlou, *Kurdistan and the Kurds*, London: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Czecho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Praque/Collet's Publishers, 1965, p. 85.

③ Phebe Marr, *The Modern History of Iraq*,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5, p. 285.

④ 也被译为“敢死战士”、“敢死军”。

⑤ Faleh A. Jabar and Hosham Dawod, eds., *The Kurds: Nationalism and Politics*, London: Saqi Books, 2006, p. 7.

田遭到毁坏,村民被强制迁入城市聚居区(*Mujamma't*),受政府的集中控制与管理。

农业衰败与工业化缺位的城市化进程使得伊库区衍生出了内外两套庇护系统。从伊库区整体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地区的主要经济来源严重依赖伊拉克政府的拨款,部落则充当着伊拉克政府影响与控制伊库区的“代理人”,是复兴党政权庇护系统中的被庇护者。从伊库区内部来看,部落向平民提供生活、生产资料与安全保障,在次一级的庇护系统中同时扮演庇护者的角色。因此,以部落为依托的库民党、库爱盟和其他库尔德政党在民族主义斗争的过程中常常表现出强烈的部落特征,政党间形成了复杂的“伙伴—对手”关系。^①它们有时为共同对抗复兴党政权结成联盟,有时则为争夺领导权、资源与领土兵戎相见,或引入外部力量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1983年至1984年间,库民党和库爱盟就曾为扩展自身势力,分别与伊朗和伊拉克政府结盟参与两伊战争。

“安法尔行动”给伊库区的农业经济造成了致命性打击,伊库区“变成一块破碎的土地,社会发展迅速失去经济基础,政党力量弱化,士气低落,库尔德人疲惫涣散”^②。1988年5月,库民党和库爱盟放弃对抗,强调民族团结,并联合其他政党宣布成立伊拉克库尔德阵线,毛拉穆斯塔法之子、库民党主席马斯德·巴尔扎尼(Masoud Barzani)和贾拉勒·塔拉巴尼共同担任主席,宣布一致对抗复兴党政权。两党领导下的伊拉克库尔德阵线奠定了海湾战争后伊库区的基本政治格局。1991年“禁飞区”设立后,伊拉克政府对伊库区实行经济封锁,实际上使该地区面临国际与国内的双重制裁。伊拉克政府无力继续维持福利政策,不断缩减对伊库区的财政预算和粮食补给,这导致其与亲政府部落间的庇护关系破裂,大多数部落加入库尔德阵线,反对复兴党政权。1992年5月,伊库区举行地方议会选举,库民党与库爱盟分获51个和49个席位(共105个席位),组建联合政府,正式形成了两党主导的地区政治权力格局。国际援助与边境贸易是该时期伊库区的主要经济来源,两党作为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Kurdistan Regional Government,以下简称“库区政府”)代表对外成为“寻租政府”,对内进行经济资源的分配与管理,取代原有的亲政府部落成为伊库区内部新的庇护者。

但库区政府的成立并没有消弭库民党和库爱盟间的冲突,两党因权力、国际援助分配和地盘争夺不断爆发小规模冲突,最终于1994年爆发全面内战,库区联合政府解散,两党分别以埃尔比勒和苏莱曼尼亚为中心形成了北南两个库区政府。1998年9月,在美国政府的斡旋下,两党达成和解,签署《华盛顿协议》。同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解放伊拉克法案》,决定推翻萨达姆政权,并对两党提供武器与资金援助。在共同“倒萨”的目标下,两党维持了伊库区局势的和平与稳定。

非生产性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伊拉克库尔德社会无法有效制约作为资源分配者

^① 唐志超:《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5页。

^② Gareth R. V. Stansfield, *Iraqi Kurdist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Emergent Democracy*, p. 47.

的库民党和库爱盟。由于经济上的双重制裁和内战期间不稳定的安全局势,伊拉克长期以来的政治腐败和经济依赖等问题在伊库区不断加剧。尽管国际援助使许多库尔德村庄得以重建,但“安法尔行动”中使用的化学毒气对农田造成了持久破坏,1996 年联合国石油换食品(Oil for Food)计划进一步限制了该地区的农业复苏。上述因素共同决定了库民党与库爱盟两党主导下的地区权力格局和伊库区“强政党,弱社会”的本质。^① 1991 年以来,两党通过掌控伊库区经济命脉、提供政治与安全庇护,建立起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将作为统治阶级的政党和各阶层联系起来,确立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牢牢地控制着整个库尔德地区。

二、伊拉克战争后库尔德地区两党政治格局面临的挑战

2003 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萨达姆时代库尔德人的自治权利被正式写入 2005 年《伊拉克永久宪法》,埃尔比勒、苏莱曼尼亚、杜胡克三省合并为库尔德自治区。国际制裁的解除、石油收入、国际投资和固定比例(17%)的中央预算拨款,推动了伊库区经济的飞速增长。伊库区政府获得的中央财政拨款从 2007 年的 50 亿美元增长到 2013 年的 120 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2003 年的 518 美元增加到 2011 年的 3,306 美元;2007 年 8 月伊库区议会通过《库尔德斯坦油气法》,伊库区政府随后和 39 家石油公司签署了 60 项开发合同。截至 2013 年上半年,来自 80 个国家的 2,656 家公司在伊库区注册落地;2006 年 8 月至 2015 年 9 月期间,伊库区投资总额达 426 亿美元。^②

伊拉克战争后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打破 1991 年以来库民党与库爱盟建立的社会庇护体系。2005 年,两党结盟参加地区议会选举,赢得 104 个席位(席位总数增至 111 席)。2006 年 1 月,两党达成战略协议,划分了各自在伊库区政府中的职位分配,并最终于同年 5 月完成政府合并,凭借对石油财富的垄断和对政府职位的掌控强化了既有的权力格局,也加剧了地区腐败问题。在精英层面,政党高层官员享受高薪待遇,甚至领取双份工资;政府中“吃空饷”现象严重,与两党关系密切者被录入公职人员名单,领取高额工资与退休金。^③ 同时,伊库区政府投资主要流入建筑业和石油工业,两党要员及其控制下的家族企业和与两党关系密切的政党、商人借助政治优势获得合同招标,逐层分包,从中谋取暴利。据统计,2006 年 8 月至 2015 年 9 月间,

^① Denise Natali, *The Kurdish Quasi-State: Development and Dependency in Post-Gulf War Iraq*,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15.

^② Nyaz Najmaldin Noori, “The Failure of Economic Reform in the Kurdistan Region of Iraq (1921–2015): The Vicious Circle of Uncivic Traditions, Resource Curse, and Centraliz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5, No. 2, 2018, p. 14.

^③ Kawa Hassan, *Kurdistan's Politicized Society Confronts a Sultanistic System*, Carnegie Middle East Center, August 2015, p. 7, <https://carnegie-mec.org/2015/08/18/kurdistan-s-politicized-society-confronts-sultanistic-system-pub-61026>, 登录时间:2017 年 11 月 5 日。

流入建筑业和石油工业的投资额分别达 136 亿美元和 130 亿美元,分别占伊库区政府投资总额的 31.88% 和 30.4%。^① 2006 年维基解密(Wikileaks)网站揭露称,私营公司在招标过程中需要向和两党关系密切的企业及政府官员分别支付 10%~30% 和 10% 的合同款才能成功竞标。^② 英国广播公司(BBC)2008 年发布的报告称,政府招标项目在经过层层分包落实到最终承建公司时,实际资金只余下合同款项的一半。^③

在社会层面,伊库区政府通过提供免费大学教育和增加公职的方式吸纳社会新生劳动力,换取政治忠诚和社会稳定。2004 年至 2012 年间,伊库区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数量分别由 1 所和 0 所增加至各 11 所,获得本科学历的毕业生可直接进入公职部门、政府企业或公私合营企业工作。2008 年至 2015 年间,伊库区政府增加了 10 万个公职岗位,截至 2015 年,近 68.2 万人出任公职,占总就业人口的 50.4%。自 2007 年起,伊库区政府 64% 的预算都被用于支付公职人员的工资。公职人员的收入构成了伊库区许多普通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④ 上述数据表明,库民党与库爱盟推行了一套广泛的社会笼络政策,以此实现政治权力向社会各领域的渗透。^⑤

然而,伊库区现行的经济结构中,中央预算拨款占地区预算的 90%,其余 10% 主要靠地区石油收入和国际投资。在工业体系中,作为伊库区主要产业的石油行业只能吸纳 1% 的劳动力,其他非石油类产业占 GDP 的比重只达到 2.6%,^⑥工业部门吸纳就业能力有限。高油价抑制了伊库区政府经济非石油化的动力,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并提供稳定就业机会的农业和制造业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2006 年 8 月至 2015 年 9 月间,伊库区政府对农业和制造业的投资均不足 1 亿美元,占总投资的比重不超过 4%。农业对 GDP 的贡献率只有 5.62%,长期无法自给自足,只能大量依靠从土耳其进口。^⑦ 单一的产业政策和受外部高度影响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两党主导下的庇护体系本身有着极强的不稳定性。受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伊库区国际投资连年下降,伊库区政府加大对土耳其的石油输出力度,导致 2014 年初马利基政府削减和缓发对伊库区的财政预算,同年下半年国际油价下跌,二者叠加使地

① Nyaz Najmaldin Noori, "The Failure of Economic Reform in the Kurdistan Region of Iraq (1921-2015): The Vicious Circle of Uncivic Traditions, Resource Curse, and Centralization," p. 14.

② Kawa Hassan, *Kurdistan's Politicized Society Confronts a Sultanistic System*, pp. 7-8.

③ Ibid., p. 7.

④ Kurdistan Regional Government: *Kurdistan Region of Iraq 2020: A Vision for the Future*, Erbil: Ministry of Planning, September 2013, p. 14, http://www.ekrg.org/files/pdf/KRG_2020_last_english.pdf, 登录时间:2017 年 11 月 15 日。

⑤ Güllistan Gürbey et al., ed., *Between State and Non-State: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Kurdistan-Iraq and Palestin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 113.

⑥ World Bank Group, *Kurdistan Region of Iraq: Reforming the Economy for Shared Prosperity and Protecting the Vulnerable*, February 2015, p. 1,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1597>, 登录时间:2017 年 11 月 21 日。

⑦ Nyaz Najmaldin Noori, "The Failure of Economic Reform in the Kurdistan Region of Iraq (1921-2015): The Vicious Circle of Uncivic Traditions, Resource Curse, and Centralization," pp. 14-15.

区财政赤字问题恶化,引发 2015 年的地区经济危机。2015 年,伊库区公职人员只领取到前 8 个月的工资,直至 2016 年 2 月,工资依旧没有恢复发放。地区贫困率从 2007 年的 7% 增长至 2015 年的 12.5%;^① 失业率从 2013 年的 7% 增长至 2016 年的 14%。^② 城市高房价也进一步加剧了伊库区普通民众的生存压力。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发展,伊库区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引发民众强烈不满。

伊库区人口特征的新变化也对两党依赖的社会基础带来冲击。1991 年以来安全局势的相对稳定促进了伊库区人口增长和人口结构的年轻化。截至 2016 年,伊库区人口达 520 万,其中 25 岁(含)以下人口占比达 50%,预计至 2020 年地区将新增 85 万至 110 万就业人口。^③ 同时,1991 年后成长起来的伊拉克库尔德人,并未经历过萨达姆的严酷统治。因此,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传统民族主义话语,在年轻人中难以引起共鸣,无法再成为两党主导与控制公共生活的合理借口。^④

此外,在农村经济结构衰弱、城市化进程加速、安全形势渐稳、现代教育普及和民族主义、民主观念不断传播等因素的影响下,部落作为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组织形式的角色开始被政党逐步取代。除杜胡克省外,部落主义在埃尔比勒省和苏莱曼尼亚省更多地以社会联系而非社会结构的形式继续发挥作用。^⑤ 2007 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4.2% 的大学生不认为自己隶属于某一个部落。^⑥ 部落认同的弱化使民众在政治上更多地认同于政党。库民党与库爱盟内部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结构的演进,都表现出强烈的建立在部落联系基础上的家族特色,但在具体方式上又有明显的区别。在库民党内部,主席、副主席、政治局中的一名成员和领导委员会的 6 名成员均来自巴尔扎尼家族;库爱盟内部也有着程度稍低但性质相同的状况。伊库区政府的核心机构——外交、军事、安全、内政等部门也完全由两党的家族成员掌控;经济、能源、通讯等部门也都直接或间接处于家族企业或与家族保持密切关系的企业控制之下。^⑦ 家族对权力和资源的垄断及不断加剧的腐败问题,不仅引发了民众的不满,也导致了政党内部的派系分化。这在库民党内更多表现为巴尔扎尼家族内部的权力之争,在库爱盟内部则表现为塔拉巴尼家族和其他家族与派系之间的矛盾。这对两党的二元政治格局也构成了挑战。

① Nyaz Najmaldin Noori, "The Failure of Economic Reform in the Kurdistan Region of Iraq (1921 - 2015): The Vicious Circle of Uncivic Traditions, Resource Curse, and Centralization," p. 13.

② "Minister: Unemployment Rate in Iraqi Kurdistan is 14%," *E Kurd Daily*, September 22, 2016, <http://ekurd.net/unemployment-kurdistan-2016-09-22>, 登录时间:2017 年 11 月 21 日。

③ Kurdistan Regional Government, *Kurdistan Region of Iraq 2020: A Vision for the Future*, p. 14.

④ Michiel Leezenberg, "Politics, Economy, and Ideology in Iraqi Kurdistan since 2003: Enduring Trends and Novel Challenges," *Arab Studies Journal*, Vol. 23, No. 1, 2015, p. 175.

⑤ Serhat Erkmen, "Key Factors for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Dynamics in Northern Iraq: A Study of Change in the Region," *Uluslararası Hukuk ve Politika*, Vol. 31, No. 8, 2012, pp. 91-93.

⑥ Mahir A. Aziz, *The Kurds of Iraq: Ethno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i Kurdistan*, London and New York: I.B. Tauris, 2011, p. 139.

⑦ Serhat Erkmen, "Key Factors for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Dynamics in Northern Iraq: A Study of Change in the Region," p. 96.

固化的政治经济格局与社会发展的错位推动了政治反对派的兴起。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伊库区就兴起了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1987 年,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和阿富汗反苏战争的鼓舞,前伊拉克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谢赫奥斯曼·阿卜杜·阿齐兹 (Sheikh Othman Abd Aziz) 领导成立了伊拉克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运动 (Kurdistan Islamic Movement, 以下简称“库伊运”),以地区南部城市哈莱布杰 (Halabja) 为据点,通过武装斗争反对复兴党政权。1992 年,库伊运参加地方议会选举,获得 5.5% 的选票,成为地区第三大政党,但没有获得席位。其随后拒绝加入两党主导下的政治进程,主张库尔德社会的伊斯兰化,继续采取武装斗争路线。1993 年至 1999 年期间,库伊运与库爱盟多次爆发军事冲突。随着 1999 年谢赫奥斯曼的去世和“9·11”事件后美国反恐战争对库伊运武装力量的打击,库伊运内部分化重组,演变为由谢赫奥斯曼的弟弟谢赫阿里·阿卜杜·阿齐兹 (Sheikh Ali Abd Aziz) 继续领导的库伊运和阿里·巴比尔 (Ali Babir) 领导的库尔德伊斯兰团 (Komal Islami)。在 2005 年和 2009 年的地区议会选举中,库尔德伊斯兰团分别赢得 6 个和 4 个席位;库伊运只参加了 2009 年选举,赢得 2 个席位,2007 年谢赫阿里·阿布杜·阿齐兹去世后,该党力量渐趋式微。此外,前穆兄会成员萨拉赫丁·穆罕默德·巴哈丁 (Salahuddin Mohammed Bahaadin) 主张和平参政,他不仅于 1994 年成立库尔德伊斯兰联盟 (Kurdistan Islamic Union),还在 2005 年与 2009 年的地区选举中分别获得 9 个和 6 个席位。在 2013 年的地区选举中,库尔德伊斯兰联盟和库尔德伊斯兰团分别赢得 10 个和 6 个席位。^①

由于农村地区有着深厚的苏菲主义传统,伊库区的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支持者主要为城市的贫困人口。伊斯兰主义运动通过开展慈善活动进行社会动员,因此其社会基础可以辐射整个地区,但以沙特和伊朗等外部支持为基础的动员方式并不稳定且不可持续,加之民族主义与世俗思想在伊库区的长期影响,这决定了库尔德伊斯兰主义运动“辐射广,底子薄”的特点。^②同时,库民党与库爱盟还通过利益输送将伊斯兰主义运动“虔诚的”支持者转变为两党庇护系统中的一环,这动摇了该运动的底层基础。据统计,2004 年至 2012 年间,伊库区的清真寺数量从 3,878 座增加至 4,770 座,伊斯兰宗教学校从 15 所增至 35 所,库区政府共给地区宗教事务部拨发了 1,160 万美元的财政预算,超过 14,700 名宗教领域的工作人员被列入库区政府公职人员名单,由政府发放工资。^③这一方面使两党能够通过公职人员及时掌握清真寺内的动向,另一方面还可以在底层塑造两党虔诚的形象。

^① [伊拉克]拉希德·哈尤努:《伊拉克政治伊斯兰百年史:逊尼派卷》(阿拉伯文),迪拜:阿联酋梅斯巴研究中心 2011 年版,第 71-72 页。

^② Serhat Erkmen, “Key Factors for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Dynamics in Northern Iraq: A Study of Change in the Region,” pp. 89-90.

^③ Nyaz Najmaldin Noori, “The Failure of Economic Reform in the Kurdistan Region of Iraq (1921-2015): The Vicious Circle of Uncivic Traditions, Resource Curse, and Centralization,” pp. 15-16.

2009 年是伊库区政党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库爱盟前副书记努奇尔万·穆斯塔法(Nawshirwan Mustafa)带领一批党内中层人员退出库爱盟,宣布成立变革运动(Gorran Movement)。努奇尔万在一篇题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诉求》的文章中指出,变革运动致力于对伊库区政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变革库爱盟一党主导下的苏莱曼尼亚政府和库民党一党主导下的埃尔比勒和杜胡克政府”。^① 2009 年 7 月 25 日,变革运动参加地区议会选举,获得选票总数的 23.72%,赢得 25 个席位。^② 2011 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变革运动组织示威游行,号召消除腐败,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打破两党长期垄断的权力局面。在 2013 年的地区议会选举中,该党超过库爱盟,赢得 24 个席位,成为伊库区议会的第二大党(库民党 38 席,库爱盟 18 席)。在 2014 年确立的政治架构中,地区议会主席、“敢战士”事务部、财政部、贸易与工业部及宗教事务部等部门部长的职务均由变革运动成员出任。变革运动的兴起为两党庇护体系外的年轻一代创造了新的参政空间,增强了地区反对派的总体力量,重塑了伊库区的政治版图。

变革运动的参政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相关领域的改革,如提高议会对政府问询的力度,提出解决财政“吃空饷”问题和提高选举透明度的议案,以及 2014 年 7 月通过的《政党财政法》,在原则上要求将政府对政党资助的年预算缩减到 1%。2015 年 6 月,变革运动提起的一系列关于修改伊库区《主席法》的议案,对马苏德·巴尔扎尼的连任造成威胁,引发库民党的恐惧。同年 10 月,在因工资停发危机引发的示威游行中,库民党在苏莱曼尼亚的办事处遭到示威者攻击,5 名办事处人员身亡,巴尔扎尼指责变革运动为幕后主使,并于当月解散议会,禁止来自变革运动的议会主席和 4 名部长进入埃尔比勒,变革运动的参政活动因此被迫中断。

变革运动的异军突起,实际上打破了 2006 年以来库民党和库爱盟维持的政党政治平衡。“2013 年大选后,库民党不再将库爱盟当作对等的盟友来看待,而是更多地将变革运动视为自己在新一届政府中的伙伴。”^③ 2011 年“阿拉伯之春”发生以来,库民党与库爱盟在处理与中央政府关系以及对叙利亚政策等问题上分歧不断,2012 年贾拉勒·塔拉巴尼健康状况的恶化及 2013 年的大选结果,使两党间的力量天平日益倒向库民党一边。政党力量的对比变化引发了伊库区政党政治版图的再调整。2016 年 5 月 17 日,库爱盟和变革运动签署伙伴协议,宣布将结盟参加原定于 2017 年底举行的地区议会选举,致力于结束伊库区政府主席的直选制度,改为从议会多数党中产生,随后领导组建伊库区政府。

^① [伊拉克]拉希德·伊马拉·栽迪、[伊拉克]尤素夫·穆罕默德·萨迪克:《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治反对派的诞生与未来》(阿拉伯文),多哈: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 2012 年版,第 20-21 页。

^② 同上,第 22-23 页。

^③ Mohammed Salih, “The New Politics of Iraqi Kurdistan,”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August 16, 2016,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the-new-politics-of-iraqi-kurdistan>, 登录时间:2017 年 11 月 5 日。

在经历了 2017 年 9 月 25 日的独立公投和 10 月 19 日伊拉克政府军重新控制基尔库克等事件后,伊库区议会于 10 月 24 日决定延长本届议会任期 8 个月,同时将原定于 11 月举行的伊库区新议会和主席选举推迟 8 个月,伊库区主席马苏德·巴尔扎尼随后于 10 月 29 日宣布辞职。^① 11 月 6 日,伊库区政府总理尼济尔凡·巴尔扎尼(Nechirvan Barzani)解除对变革运动的“禁令”,邀请其议会主席和部长重回埃尔比勒,但遭到后者拒绝。变革运动联合伊斯兰团和前库爱盟副书记巴尔哈姆·萨利赫(Barham Salih)于当年 9 月成立民主与正义联盟(Coalition of Democracy and Justice),要求尼济尔凡·巴尔扎尼解散现任政府,成立过渡政府。该倡议随后遭到库民党与库爱盟的一致反对。^② 12 月 18 日,苏莱曼尼亚爆发示威游行,要求现任政府辞职,提前举行大选,变革运动和伊斯兰团随后于 20 日宣布退出政府。^③

三、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两党政治格局的困境与前景

伊拉克战争后伊库区的社会变化和反对派政党的兴起,重塑了伊库区的政治版图,但却并未打破库民党与库爱盟建立的广泛的社会庇护体系及两党主导下的政治格局,经济、能源、军事、安全、内政等核心部门依旧掌握在两党手中。以军事安全为例,据变革运动 2014 年的调查显示,“敢战士”事务部登记在册的现役和退休人员共 40 万人,现役人员达 19 万至 25 万人,但“敢战士”事务部实际上能调度的人员不足 4 万人,^④伊库区核心武装力量依旧为两党所控制,其中以库民党控制下的第 80 旅和库爱盟控制下的第 70 旅为代表,各自人数超过 5.8 万人;此外,伊库区政府内政部下属的准军事化警务力量“宰拉瓦尼”(Zeravani)同样呈现出高度的党派化特点,它从库民党“敢战士”部队中分化而来,人数达 5.1 万人,目前由库民党政治局委员、内政部部长阿卜杜·卡里姆·苏尔坦·辛贾里(Abdul Karim Sultan Sinjari)领导。^⑤ 如 2014 年 8 月,面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攻势,库民党并未选择保护受围困的雅兹迪人,而是下令“宰拉瓦尼”部队从辛贾尔山撤出。2014 年 6 月“伊斯兰国”组织兴起后,伊库区周边安全态势恶化,美国和伊朗等国家在军事和政治上加大对库区政府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强化了两党在地区政治生活和公共安全中的作用,变革运动领导的

^① 魏玉栋:《伊拉克库区主席巴尔扎尼宣布辞职》,新华网,2017 年 10 月 30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2017-10/30/c_1121873645.htm, 登录时间:2017 年 11 月 7 日。

^② “Gorran Rejects PM Barzani’s Invite to Rejoin KRG,” *Rudaw*, December 6, 2017, <http://www.rudaw.net/english/kurdistan/061120175>, 登录时间:2017 年 11 月 26 日。

^③ “Gorran and Komal Withdraw from KRG,” *Rudaw*, December 20, 2017, <http://www.rudaw.net/english/kurdistan/201220172>, 登录时间:2017 年 12 月 21 日。

^④ Kamal Chomani, “The Challenges Facing Gorran to Change,” *Kurdish Policy Foundation*, September 5, 2014, <https://kurdishpolicy.org/2014/09/05/the-challenges-facing-gorran-to-change/>, 登录时间:2017 年 11 月 25 日。

^⑤ “Over 150,000 Enlisted as Peshmerga Troops in Kurdistan Region, Official Data Shows,” *Rudaw*, April 3, 2017, <http://www.rudaw.net/english/kurdistan/03042017>, 登录时间:2018 年 2 月 14 日。

反对派改革进程失去后劲,在 2015 年 10 月因被禁止参政活动而陷入全面瘫痪。此外,在 2018 年 5 月的全国大选中只赢得了 2 个席位,巴尔哈姆·萨利赫于 2018 年 9 月辞去民主与正义联盟主席一职,重新加入库爱盟,并作为该党提名的候选人于 10 月担任新一任伊拉克总统。^① 这持续削弱了反对派运动的力量,民主与正义联盟随后宣布将以“政治和民间性质”的形式继续维持该党的运转。^②

非生产性的寻租经济决定了伊库区难以产生可以转化为民主政治力量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文化。政治和经济上长期形成的依附文化和心理,使得包括许多变革运动支持者在内的失业青年都希望成为公职人员,不愿进入其他领域就业。^③ 变革运动与库爱盟结盟和巴尔哈姆·萨利赫回归库爱盟的行动表明,反对派运动无力兑现选举承诺,正面临发展困境。对变革运动和库爱盟而言,结盟与回归是各自谋求其政治未来、重启改革议程的合理选择。而对库爱盟而言,这并不意味着 2006 年与库民党签署的战略协议的终结,联合的最终目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而是为了重塑库爱盟与库民党的力量平衡与对等地位,继续维持库爱盟所垄断的政治经济结构。卡瓦·哈桑(Kawa Hassan)认为,变革运动的崛起本质上是依托于一套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的对抗性话语,在其很多理想主义追随者的眼中,失败的参政经历和与库爱盟的结盟是该运动腐化的标志,也必将对其社会基础造成侵蚀。^④ 巴尔哈姆·萨利赫出任伊拉克总统,使很多人就伊库区的改革进程持乐观态度,但托比·道奇(Toby Dodge)指出,巴尔哈姆掌权所遵循的方式本身就与其所倡导的改革理念相悖,其幕后与各党派所作出的政治妥协,将成为其落实改革承诺的阻碍。^⑤ 因此,如何在解构的同时建构一个不被旧有体制侵蚀的替代性发展模式 and 构想,重新确定利益分配格局,将是伊库区反对派面临的巨大挑战。而在此过程中,库民党与库爱盟的改革意愿和有利的外部环境,将是成功打破两党结构的重要条件。尽管如此,伊库区的两党政治格局目前依旧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这主要表现在两党内部、两党之间和两党外部三个层面。

第一,从两党内部来看,派系分化与换代问题或将进一步改写伊库区的政治版图,动摇两党格局的根基。就库民党而言,其派系斗争主要局限于巴尔扎尼家族内部,并且由于党内政治局成员长期关注商业活动而非党内政治发展,因此在党内整

① “Barham Salih Elected President of Iraq,” *Rudaw*, October 2, 2018, <http://www.rudaw.net/english/middleeast/iraq/02102018>, 登录时间:2018 年 10 月 4 日。

② “CDJ To Continue Political, Civil Work After Departure of Barham Salih,” *NRT*, September 19, 2018, <http://www.nrtv.com/En/News.aspx?id=5292&MapID=1>, 登录时间:2018 年 9 月 25 日。

③ Gülistan Gürbey et al., ed., *Between State and Non-State: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Kurdistan-Iraq and Palestine*, p. 109.

④ Kawa Hassan, *Kurdistan's Politicized Society Confronts a Sultanistic System*, pp. 22-23.

⑤ Toby Dodge, “Is There Hope for Reform in Post-Election Iraq,”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7, 201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iraq/2018-10-17/there-hope-reform-post-election-iraq>, 登录时间:2018 年 10 月 19 日。

合和稳定性方面,库民党要高于库爱盟。目前,库民党内部就代际更替问题主要形成了以马苏德·巴尔扎尼长子马斯鲁尔·巴尔扎尼(Masrour Barzani)和其侄子尼济尔凡·巴尔扎尼为首的两支派系,二者间的权力斗争将成为决定库民党未来走向的关键。但马苏德·巴尔扎尼目前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地位决定了库民党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大的变动。在库爱盟内部,则存在以塔拉巴尼家族为首的三大派系。2012年贾拉勒·塔拉巴尼患中风后,塔拉巴尼派系主要由其妻子希罗·易卜拉欣·艾哈迈德(Hero Ibrahim Ahmed)和幼子库巴德·塔拉巴尼(Qubad Talabani)所主导。另外两派分别由党副书记巴尔哈姆·萨利赫和科斯拉特·拉苏尔(Kosrat Rasul)所领导。党内就代际更替问题难以达成共识,最终投票被暂时搁置。即使在塔拉巴尼家族内部,对于塔拉巴尼幼子库巴德·塔拉巴尼的继承人身份,也存有很大的争议。2017年9月巴尔哈姆的退出和2017年10月塔拉巴尼的逝世,进一步削弱了库爱盟的力量,尽管巴尔哈姆2018年9月重新加入库爱盟,但二者围绕改革的理念差异,使得这种回归影响有限,同时也充满不确定性。

第二,从两党关系来看,双方围绕党派既得利益和库尔德民族主义话语主导权的竞争,使得两党关系充满易变性,对既有格局也造成冲击。长期以来,库民党和库爱盟都将自身界定为库尔德民族主义的代言人,并竞相争夺库尔德民族主义话语的主导权。历史上,两党为维护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共同利益曾多次放弃对抗,采取统一行动。例如,1988年两党领导组建的伊拉克库尔德阵线和1998年两党达成的和解,都是出于共同反对萨达姆政权的目的;2014年“伊斯兰国”组织兴起后,两党为维护地区安全而采取统一的军事行动。但需要指出的是,促成两党间合作的核心因素往往是伊库区严峻的外部环境或大国意志,当政党自身力量强大或外部环境允许时,党派乃至个人利益往往会超越伊库区的整体利益,导致两党关系恶化。随着原定于2017年11月的库区议会选举临近,为应对变革运动与库爱盟结成的选举联盟和寻求个人的连任,马苏德·巴尔扎尼不顾各方反对于2017年9月25日举行伊库区独立公投,以增加选民支持。但此举最终使得伊库区遭到国际社会孤立,伊拉克政府夺回石油重镇基尔库克,库民党与库爱盟间的分歧也随之加剧。

第三,从两党外部来看,伊库区高度依赖外部支持的政治经济结构使得两党间的互动充满代理人色彩。库民党和库爱盟基于二者在伊库区北部和南部形成的势力范围,分别建立了亲土耳其和亲伊朗的经济系统。受深居内陆和缺乏出海口的地理环境限制,伊库区石油主要依靠土耳其杰伊汉港(Ceyhan)输油管道和两伊边境的输油管道向外输出石油。据统计,2014年伊库区向土耳其和伊朗输出石油分别达到每日32万桶和5万桶。^①大量非官方的边境贸易也构成了双边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 Bijan Khajepour, "Assessing Impact of Shifting Iran-KRG Relations," *Al-Monitor*, October 16, 2017, <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7/10/iran-krgeconomic-ties-trade-geostrategic-concerns.html>, 登录时间:2017年10月19日。

分。在中东剧变的背景下,作为伊库区第一和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土耳其和伊朗分别通过支持库民党和库爱盟实现了经济影响力向伊库区政治领域的渗透。在土耳其方面,库民党是其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打压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PKK)和遏制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的重要抓手。伊朗则通过支持库爱盟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来保障本国西部边境的安全。而在中东教派冲突的背景下,库民党和库爱盟又各自构成了逊尼派阵营和什叶派阵营当中的一环。^① 上述因素使得两党间的政治互动充满了代理人色彩。以 2017 年 9 月 25 日的伊库区独立公投事件为例,伊朗因反对公投对伊库区采取石油禁运、关闭巴什马赫口岸等经济反制措施,并最终在 10 月中旬爆发的基尔库克危机中促成了库爱盟的撤军,^② 引发库民党和库爱盟之间的相互诘难和小规模冲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外部对内部的影响也非单方面的,两党的统治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有效地为伊库区提供政治和经济庇护,因此为实现打压异己争夺资源、巩固自身在伊库区合法性地位的目的,两党也不惜配合引入外部势力。^③

四、结 语

通过分析伊库区两党政治格局的演变及当前态势可以发现,两党内部、两党之间和两党外部的三层因素相互叠加与强化,共同塑造了伊拉克库民党与库爱盟不断拉锯、争夺、妥协的政治格局。目前来看,两党的二元权力结构依旧存在,并不断受到变革运动、伊斯兰主义运动等反对派的冲击与挑战。2009 年以来库爱盟的分化重组和“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客观上促成了库民党力量的上升,库爱盟和以变革运动为主导的反对派力量基于各自相对弱势的现实,在短期内将继续维持联盟态势,以平衡和打压库民党力量,但这并不能消弭联盟内部在政治理念上的分歧,伊库区可能出现“两党—反对派两个阵营并立,库民党—库爱盟—反对派三股力量互动,维护与变革现有体制的两种理念竞争”的政党政治格局。在后“伊斯兰国”时代,伊拉克库尔德人的重要性下降,伊拉克中央政府的力量逐渐得到强化。在此情况下,适时的合作与长期的竞争将是伊拉克库尔德两党关系发展的基本特点,并将主要围绕政治制度、经济资源、军事安全、外交政策等四个核心问题逐步展开。

(责任编辑:邹志强)

^① [伊拉克]贾希姆·尤尼斯·哈里里:《2003 年后伊拉克库尔德问题中的海湾角色》(阿拉伯文),载《阿拉伯人未来》2017 年第 11 期,第 59 页。

^② Fazel Hawramy, “How Iran Helped Baghdad Seize Back Kirkuk,” *Al-Monitor*, October 16, 2017, <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7/10/iran-kirkuk-recapture-soleimani-quds-force-eqbalpour.html>, 登录时间:2017 年 10 月 19 日。

^③ Denise Natali, *The Kurdish Quasi-State: Development and Dependency in Post-Gulf War Iraq*, p. xxvii.